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潘雨桐《河岸传说》的生态意识

科目编号: ULSZ 3094

学生姓名: 陈晓慧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许文荣 老师

呈交日期: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研究方法与思路	2
第三节：前人研究概况	3
第二章：马华生态文学及潘雨桐生态意识的觉醒	5
第一节：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	5
第二节：潘雨桐生态意识的觉醒	8
第三章：《河岸传说》所蕴含的生态意识	11
第一节：人和自然生态的关系	11
第二节：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	15
第三节：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	19
第四章：《河岸传说》所运用的艺术手法	22
第一节：意象特征	22
第二节：魔幻叙事手法	25
第五章：结语	29
参考书目	31

论潘雨桐《河岸传说》的生态意识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4ALB00342

日期：2017年11月10日

摘要

如今自然生态遭受破坏的情况日益严重，人类贪婪自私的本性，是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透过文学的力量，可以达到警戒及压抑人类贪婪本性的作用。因此，笔者选择了潘雨桐的《河岸传说》作为研究对象，试分析潘雨桐是如何透过文字，强调人与自然生态应保持和谐关系，告诫人们破坏自然的严重性，并使人们对此进行反思。

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此部分主要是阐明笔者的研究动机与目的、说明笔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和论述前人研究的概况。在第二章，本论文将简述生态文学的定义，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和潘雨桐的人生历程，从中探讨潘雨桐生态意识的觉醒。第三章则是讲述笔者所得的分析成果。笔者认为《河岸传说》所蕴含的生态意识有三，一是自然生态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二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三是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笔者将在本论文例举《河岸传说》里的故事情节和对话，借此加强及论述笔者的观点。第四章则是探讨潘雨桐艺术手法的运用，看其如何带出《河岸传说》的生态意识。第五章为结论，总结本文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潘雨桐 生态文学 人和自然 生态意识

致谢

我在大学的学习时光已接近尾声，无论我的未来如何，我都不后悔选择了中文系，因为在这里我遇见了特别的朋友，和特别的老师。因此，我想借着这份毕业论文，向所有关心、帮助和鼓励我的人，表达我内心由衷的谢意。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仅对我有养育之恩，同时也支持我到拉曼大学就读的决定。我在此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和支持，让我顺利完成大学直至毕业。

其次，我想感谢与我同届的同学和朋友。我为无法和同届生一起毕业感到遗憾，但他们曾许诺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而这份承诺成为我完成毕业论文的动力。不仅如此，这些年来，若没有他们的相伴，鼓励以及安慰，及时中断我辍学的想法，我亦难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为此我想在此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再来，我想感谢中文系的全体老师，在入学之初，我对学术研究没有任何概念。多亏了老师们这些年的教导，我才逐渐掌握学术研究的知识，从而顺利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此外，他们在课堂所传授的生活经验，亦让我今生受益无穷。

最后，我在此特别感谢许文荣老师对我的指导。他不仅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同时也是我大学即将结束之际，为我上最后一堂课的老师。在选题方面，许老师给予我一盏明路灯，让我找到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在书写论文时，他给予我自由发挥的空间；遇到研究难题时，他总会在旁给予我协助；即使他忙得分身无术，也会抽空修改我的论文，直至我完成论文为止，因此我要在此特别感谢许文荣老师对我的指导。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认为生态文学是值得关注的题材，这是因为现今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诸如温室效应、空气污染、冰山溶解等众多经常问题。若这些问题仍持续发生，人类的后代将失去良好的生活环境。如今人类在面临生态危机时，其解决方法是拟定针对性的政策，例如回收可循环的废物加以利用，减少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尽量避免制造有害废物等政策。虽然这些政策能够舒缓生态环境的恶化，然笔者认为只有压抑人类贪婪自私的本性，才是根治自然生态危机的方法。向来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的马华文学作者，此时正是体现了它的力量，以创作一系列反映自然环境恶化的作品，以达到警戒及压抑人类贪婪本性的作用。

潘雨桐是位优秀的马华作家，他在生态文学方面也有所涉猎。虽然他这方面的创作不多，却与其他作品别具一格。其作品所关注的对象是以婆罗洲热带雨林为主，这是因为他曾担任过园丘经理，参与了森林开拓和种植油棕的工作。他在亲眼目睹了砍伐树木的过程后，便开始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反思，然后将心中的领悟、反思和感受化为文字，故笔者认为潘雨桐的生态文学创作，是值得研究的作品。虽然如此，潘雨桐的作品却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因为比起不常接触的自然生态，人们更加喜欢接触科技和娱乐方面的知识，这导致潘雨桐的生态意识无法顺利传达。

综合上述原因，笔者选择以潘雨桐所著的《河岸传说》作为研究题材，分析他如何透过文字，强调人与自然生态应保持和谐关系，告诫人们破坏自然的严重性，并使人们对此进行反思。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论文旨在研究潘雨桐《河岸传说》的生态意识。首先笔者将采用文本分析法来进行研究，即细读〈河水鲨鱼〉、〈河岸传说〉、〈旱魃〉、〈山鬼〉、〈沼泽地带〉，及〈河口〉，从文本中分析出具有启发人们生态意识的情节和要点。在探讨其生态意识之前，笔者将简述生态文学的定义，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和潘雨桐创作的人生历程，然而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是伴随自然生态危机而兴起。“**马来西亚人民的环保意识可说是在甲板埋毒、高原塌楼、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的激发下，得到较大的觉醒和普遍化，而这也反映在一些马华文学作者的诗文中。**”（田思，2006：23）这导致现今尚未有专门的文献，详细记载马华生态文学发展的过程，同样的潘雨桐亦没有书写人生历程，和其觉醒生态意识方面的记载。笔者将采用文献研究法，即通过参考前人的研究文献来获得这方面的资料。

在分析《河岸传说》后笔者认为其所蕴含的生态意识有三，一是自然生态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二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三是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除此之外，“**文学艺术与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本体论上讲，文学与艺术之花总是植根于大自然的泥土之中的。**”（鲁枢元，2001:258），故笔者亦视潘雨桐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为本论文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会影响其《河岸传说》是否能够顺利地传达生态意识。笔者将会借鉴前人对潘雨桐的评论，融入生态文学的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分析，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诠释。

第三节 前人研究概况

笔者将在此部分说明本论文和前人研究之间的关系，或是如何从前人研究中获得新的研究思路。目前有关潘雨桐生态意识的研究成果，虽不至于寥寥无几，但也尚未达到浩如烟海的地步。前人研究的论述的类型多为文本分析，其中有陈大为所编写<寂静的浮雕——论潘雨桐的自然写作>、金进所著<情感追忆与生态文学：潘雨桐>、田思的<马华小说中的环保意识>、和游杰华所编<论潘雨桐的婆罗洲雨林自然写作>。陈大为是以一个开拓者的视角，来分析潘雨桐的《东谷纪事》和《大地浮雕》。笔者是从他对潘雨桐对生态保育问题的看法，看出潘雨桐生态意识的雏形，即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自然是以神秘力量，对人类进行报复。

金进从历史背景、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研究这三方面入手，试图勾勒出1919年以来马华文文学发展的轨迹，潘雨桐是其论述对象之一。他的主张“**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金进，2013：264）使笔者决定探讨《河岸传说》中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与态度。

田思不仅对《河岸传说》进行文本分析，其绪论和<环保不行，危机不止>亦为本论文提供了马华生态文学发展的资料。至于游杰华的论文，笔者主要参考他对生态文学的定义，有关马华生态文学发展的论述，和其是如何对《河岸传说》进行文本分析。

其次较多的前人研究是专题研究，有陈韦贻所著《书写雨林——潘雨桐小说中的南洋图象》和刘秀丽的《潘雨桐生态文学研究》。陈韦贻论述了潘雨桐所采用魔幻与神话的叙事手法，同时详细地列举潘雨桐对热带雨林的场景。故在艺术手法方面，笔者将借鉴陈韦贻的论文。本论文与刘秀丽的《潘雨桐生态文学研究》所研究的范畴大致相同，皆是以生态文学为视角和《河岸传说》为研究作品，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其一是刘秀丽的论文并未提及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过程，而是专注与例举有关生态危机的事件；其二是笔者并没有将潘雨桐和何乃健的生态意识和创作手法进行比较。笔者主要参考刘秀丽结合了中国传统思想，来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思路。

前人研究论述的类型，最少的是比较研究，目前只有孙彦庄、伍燕翎所著的〈何乃健和潘雨桐——自然写作的探〉而已。其实孙彦庄、伍燕翎这篇论文，并没有将两者进行深入比较。其首先说明自然写作的兴起，其次是分别介绍何乃健和潘雨桐的生平和作品，最后才在小结将两者进行比较。笔者主要是参考其对潘雨桐生平和生态意识觉醒的论述。

第二章 马华生态文学及潘雨桐生态意识的觉醒

第一节 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

“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一词是由“生态学”（Ecology）一词演变而来，最早提出“生态学”概念的人是德国生物学家赫格尔（Ernst Haeckel）。在早期“生态学”原是指研究生物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代名词，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形成生态危机后，“生态学”逐渐延伸成“生态文学”，成为一种关怀生态环境的文学。

对于生态文学的定义，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的论述概括了生态文学的主要核心特点，“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揭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根源，呼唤保护意识，弘扬生态责任，推崇生态整体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突出特点。”（王诺，2003：7）

第一点，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即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生态，不可避免起冲突时，需以生态的整体利益为主。第二点，生态文学是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生态关系的文学。第三点，生态文学是揭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根源的文学。最后一点，生态文学是以预警的方式，传达出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后果，或宣传人类与自然应和谐共处的思想的文学。

西方的生态文学思想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当时已有人自觉地发起环保运动，并提出“绿色觉醒”和“绿色力量”的口号。接着于1970年4月22日在美国共有2000多万人举行了环境示威游行，后来这项运动形成一种惯例，于是将这天定为“世界地球日”。此外，该活动还间接地催生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

会议。此会议于 1972 年 6 月 5 日，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后来这天也被定为“世界环境日”。环保运动变成了全球性的运动，正值发展中的马来西亚自然也参与其中。

随后马来西亚政府于 1970 年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该政策让我国由农业社会转为工商业社会。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类的每一项改革与进步，或多或少，都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自我国转为工商业社会后，为了建立工厂，导致大量的土地被开发。其结果是工厂林立，所排出的废料和废气，逐带来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源污染，垃圾堆积等问题。受到西方环保运动的影响，这些环境问题随之成为了媒体报导关注的对象。

这些报道对马华的生态文学可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马华作家向来将反映社会现实的职责，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在看到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人们和马华作家开始意识到生态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性。于是本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环保思想。正如田思在《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自序》中提到“从 1990 年代最初几年开始，我就创作了一系列的环保诗。……期间发生了不少有关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的问题，这些都成了我写作环保诗的题材来源。我的环保诗涉及很广，包括森林被滥伐、水土流失、烟霾灾害……”（田思，2006：3）在众多马华文学作家，当中是以潘雨桐、田思、何乃建为佼佼者。

马华生态文学起步较晚，从田思的自序得知大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很大的程度上是借鉴及参考了西方和中国的论述。“1999 年 1 月 14 日，我和何乃健、爱薇应邀参加了由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国立大学联办的第二届“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

研讨会。……有机会与许多来自中国等地的代表们交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以精湛的学养，把西方环保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德”观念联系起来，给我很大的启发”（田思，2006：4）由此可见，田思是在研讨会受到周策纵的启发后，才有了书写马来西亚华文环保文学的专门著作的想法，为马华的生态文学踏出第一步脚印。

何乃健前期的作品主要是描绘大自然和乡村生活，后期则以提倡环保思想为主，这类作品多数收录在《稻香里说丰年》、《逆风的向阳花》、和《禅在蝉声里》。在参加研讨会前，田思阅读了何乃健的几本散文，认为有必要推广及系统化何乃健的环保思想，于是撰写了《环保意识的三大支柱——谈何乃健的环保散文》，这成为了马华生态文学的经典。

至于马华生态文学的体裁方面，“在数量上以散文和报告文学最多，诗歌居次：而小说中带有环保意识的，似乎只有寥寥几篇。”（田思，2006：25）这是因为有时候，在倡导环保思想的过程中，会和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发生冲突，随之成为一个敏感的议题。然而小说不能像散文和诗歌一样，用以小见大，暗藏褒贬的方式传达环保思想，只能以曲曲折折地将环保思想暗藏在故事情节中，极其考验作者的写作功力，故马华环保小说的创作较少。

第二节 潘雨桐生态意识的觉醒

潘雨桐原名为潘贵昌，于1937年出生于森美兰文丁，其祖籍是广东梅县。他于森美兰的芙蓉中华中学就读初中，1954年毕业后便前往新加坡中正中学继续他的高中生涯，于1957年高三毕业。在中学就读期间，潘雨桐便以“凌紫”为笔名，在《星洲日报》发表了不少的作品，为他日后的写作之路打下扎实的基础。

接着1958年，潘雨桐到台湾国立中心大学修读园艺系。他于1962年荣获农学士，同年到美国俄克拉何玛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深造，于1971年荣获遗传育种学博士。他在美国呆了将近十年，又于1972年回到台湾国立中兴大学，担任园艺系暨研究所副教授，直到1975年才返回马来西亚。在外留学期间，潘雨桐因为课业繁忙、醉心于学术研究、或四处游览美洲风景，从而导致他在创作上处于冬眠状态。虽然如此，他的文笔并没有因此而荒废，那些阅历反而让他的思想及视野延伸开拓至另一个领域。

在返回马来西亚后，潘雨桐开始投身于农业界，在龟咯（Kukup）与小笨珍（Pekan Nenas）中间的柏马思（Permas）担任某集团的园丘经理，并常到东马以及邻国出差。在返马后约1979年，他再次提起手中的笔，改用潘雨桐为笔名，于《南洋商报》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品。潘雨桐的一生，从马来西亚出发，到新加坡、台湾、美国留学，再回到台湾工作两年，最后回到马来西亚落叶归根。

笔者是从他小说题材的变化中看出，其生态意识是在返回马来西亚后才开始觉醒。他首两部小说，《因风飞过蔷薇》和《昨夜星辰》，主要是描述华人在外漂泊时，挣扎与奋斗、痛苦与希冀、生存危机与现实困境。他刚返回马来西亚，故作品多以描写留美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心态为主。《静水大雪》和《野店》这两部小说集，内容主要有对原住民、非法移民、少数族裔妇女的人文关怀，有有关弱势族群的议题，以及热带雨林的书写特色等。热带雨林、原住民、弱势族群是马来西亚的特征之一，潘雨桐对这些特征的关注，证明了他已对这土地产生情感。当潘雨桐对故乡产生情感后，随之就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忧患意识，于是到了第五部小说《河岸传说》，潘雨桐更加地深入地关注及描写，马来西亚热带雨林遭受破坏的情景。

潘雨桐的生态意识的觉醒，不仅是因归属感而产生忧患意识，同时也与他的工作有关。他身为园丘经理，需长期居于油棕园内，所接触的工作主要是到沙巴的深山雨林开辟、烧芭以及垦殖。在这样环境下工作，他经历自然生态被破坏的过程，这让他开始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反思。加上他曾攻读遗传育种学，比起旁人更了解生态危机的产生，是因为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后，所造成的结果。

于是潘雨桐的生态意识便开始觉醒，在《河岸传说》的后记，潘雨桐提到“.....在人与热带雨林之间，竟是如此的不相容——热带雨林每年正以二千万公顷的速度消失。消失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未知。”（潘雨桐，2002：327）笔者从他的后记中，得知潘雨桐向往着热带雨林，所以选择到山野阳光下工作，然最后短短两句揭露出潘雨桐在工作后，对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行为感到震撼及无奈，这让他致力于生态文学的创作。

有论者对潘雨桐一方面书写生态文学，却从事园丘经理的工作感到矛盾，然笔者认为工业化的兴起，不是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而是由人类对物质的追求，膨胀的欲望所引起。在小说里潘雨桐是认为人类与生态的关系是共存的。他大力谴责的对象，皆是因贪婪而过度破坏自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人类。因此，笔者认为只要潘雨桐是以珍爱热带雨林的心态，他创作生态文学和他所从事的行业并没有太大的冲突。

第三章 《河岸传说》所蕴含的生态意识

第一节 人和自然生态的关系

在论述生态文学时曾多次提到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那么究竟这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据王诺的说法两者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中国学者则借鉴了“天人合一”的观点来诠释这种共生关系。“天人合一”里的“天”若以生态文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天”可以是指自然生态。祁松林提到“在儒家看来，天、地、人构成统一的整体世界，三者之间的相生与共存推动着宇宙世界的运行与发展，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道家认为“道、天、地、人”是“域中四大”，共同构成了宇宙的整体，并且彼此协调一致推动着世界的运动变化。”（祁松林，2016：32）这说明了自然生态和人是一体的。虽然如此，但人类必须依靠自然才能生存，而自然却能在摒弃人类后独立存在，因此人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自然生态命运的主人，否则为何是“天人合一”，而不是“人天合一”。

作为生态文学，其作用重在突出及宣传人类与自然生态应和谐共处的思想，潘雨桐的《河岸传说》不仅很好地表现了两者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同时也揭露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失衡的事实，和其所造成的后果。在〈河口〉篇，自然生态给予人类生存的空间和元素，如空气、水源及食物，而作为对自然生态的回报，人须负起照顾自然生态的责任，用心存感激的心态去尊重它。

〈河口〉篇的主角林芋头和水鬼是靠着河口过生活的人。原本他们过着依靠自然的生活也能过得好好地，却在有一天他们忽然“失业”了。

“是呵，真是倒霉，你钩不到螃蟹，我捞不到蛤，连海上的鱼也游走了。难道，出了什么妖精不成？”

“什么妖精，我们河口一带，一向平安大吉——七月酬神戏一演七天。”（潘雨桐，2002：227）

水鬼将他们“失业”的缘由归根于出了妖精，但林芋头以七月酬神否定了水鬼的想法。潘雨桐借助他们的对话，带出了当自然和人类处于和谐共生关系时，河口人向自然生态索取食物来源，人类以演戏的方式，来感谢自然生态付出的相处模式。接着潘雨桐借石头嫌弃在河口生活的日子，和养父林芋头的吵架，向读者们展示自然生态和人类，已失去平衡关系的情况和原因。

“嫌脏，你怎么长大的？”

“也不是一定要在烂泥里打滚。”

“做人不可以忘本。”

“我不想像水鬼一样趴在河口的烂泥里。”

“你和水鬼都在河口长大，我则在河口终老。”

“以后不要再把我和水鬼扯在一起。”

“他也没有饿着。”

“我不捞蛤，也不钩螃蟹，一样没有饿着。”

“你现在是城里人了，这屋里脏，这河口也脏。”

“现在谁不讲环境卫生。”

“我不懂什么环境卫生，你们城里人懂，是谁把垃圾都倒到河边来？”

“这不关我的事。”

“难道是河口人的事？”

“你看到城里人乱丢垃圾了？”

“我们脏，我们脏，你们却吃我们捞的鱼，我们抓的虾——现在就快没得吃了，大海里鱼虾都游走了。我也钩不到螃蟹，连水鬼也捞不到蛤了。”(潘雨桐, 2002: 236-237)

笔者认为林芋头的生活方式，代表着自然和人类的共生关系，石头代表着随着社会文明发展而“忘本”的人类。林芋头和石头的吵架，象征着自然生态和人类发生冲突；“城里人”将垃圾倒入河中的行为，则象征着共生关系失衡的缘由；而河中生物不见踪影，连累河口人失去生活来源，便是关系失衡所带来的结果。

在〈山鬼〉篇里，潘雨桐借着铁头和祭司老人的对话：

“我们以前这里可不是这样，一切都是天生自然，山里有什么，百年千年，都不会改变。树倒了，枯了，死了，三年五年，十年百年，还不是又长了上来。沟塞了，雨水自然会闯出另一条沟来。我们走在山里，三天也好两天也好，认得树认得沟，就算是沼泽山崖石壁。我们都可以走得出来，从来都不出事。到大河去也一样，那就更好认啦，划船上到源头。还是顺流下去，日也好，夜也好，撒把网，总是可以喂饱肚子。就算有人碰上鲨鱼，河里的鲨鱼呵，长得像潜水艇那么大，我们不当做金鱼玩？哪怕？哪怕？可是，现在，好像什么都改变了。到山里去一趟，留下光秃秃的山壁，大雨一来，漏斗一样，全都冲了过来，不逃命，淹死人。”

“现在有桥有路，车子都开得过去，不是更方便吗？”

“方便，方便什么？我们又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你们太落后了，现在到处都发展，大家谈的都是高科技，你懂不懂？”

“你懂？”

“我当然不懂，人家懂。电脑一打开，什么都有了。”

“电脑里能不能捞一条鱼出来，好让我做了法事拿回去煎了？能不能一按就把加里曼丹吹过来的浓烟扫回去？能不能——”

“算了算了，斗嘴有什么用？把山神给请了去，快。”

“山鬼，是你们触怒了山鬼。”

“可恶。”

“山鬼不可恶，我们世世代代都相安无事。”（潘雨桐，2002：145-146）

说明了人类在早期能与自然生态相安无事地存在同一个空间，只因彼此的关系是共生的。潘雨桐利用老人哀怨，和维护山鬼的叙述，向我们透露人类随着科技的进步，对自然生态的敬仰逐渐消失，导致世代流传的共生模式不复存在。

总的来说，潘雨桐的作品致力于让我们明白，自然生态和人类是一体的，因为“人是自然的小小分子，永远也不能脱离自然，只有确保整个自然的持续存在，才能保证人类自身安全、健康、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张晓琴，2006：8）在阅读《河岸传说》后，笔者认为目前人类首要做的事，是学会用心存感激的心态去尊重自然，这样才能回到人和自然其乐融融的共生模式。

第二节 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

如前所述，在生态危机还未发生时，人类和自然生态之间是共生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共生关系开始破裂？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乔纳森·莱文认为人类社会文化，决定了人类在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如果不从这方面去思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我们只能表达出肤浅的生态意识，无法起到生态文学“揭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根源”（王诺，2003：7）的作用。故本节将解析潘雨桐《河岸传说》的故事情节，从中探讨影响人类对待自然无情的态度，导致共生关系失衡的原因。

多数学者将酿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归根于人类中心主义。王顺玲在《生态伦理及生态伦理教育研究》概括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定义，“（一）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理性的存在物，因而人自在的就是一种目的；（二）只有人具有内在价值，其它存在物只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只有工具属性，其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三）道德规范只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只关心人的福利，人是唯一的道德顾客，享有道德关怀资格，也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非人存在物不具有道德关怀资格，不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王顺玲，2013：40）由此可见，人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独特个体，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是加深了人类这样的想法。人不再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中，而是认为自己有能力去主宰大自然的命运，随之膨胀了人类利用及改造自然生态，以获取利益的贪欲。人们开始永无止境地自然生态索取，并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当共生关系不再平衡，生态危机自然发生。

也有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加速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张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性和对利润的无限追求性，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使人与自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张莹，2013：17）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为首要目标的思想，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选择了伤害自然生态的生产方式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人与自然处于对立关系。

笔者认为潘雨桐的《河岸传说》结合了这两种说法，如在〈河水鲨鱼〉篇里艾玛和杜维拉的对话：

“这里的工程快完成了。”

“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吗？京那巴登岸河那么长，山那么多，树那么多，你砍得完锯得了？做一辈子都做不完。”

“那倒是，到工地边缘看看，山连山，连到天边。”

“整个工程从河边开始，一直延伸到山麓耸立的山壁为止，总也有上万英畝的雨林，依循著地形划分的区集，赶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树木清除殆尽。”

“好好存钱吧！”（潘雨桐，2002：28）

揭露了伐木集团为了获取利益，视自然为自己的所有物，伐木工程可谓是接踵而来，直至将森林的资源掠夺殆尽方才罢休。即使没有杜维拉这个工人，总会有其他人为了钱，而接下这份工作，充分地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才是导致雨林大面积消失的元凶。

〈河岸传说〉的主角是阿楚和其女友萝伊丝，前者是受西马公司雇佣的测量员，后者是原住民女工。萝伊丝在与阿楚聊天中骂道：“你们那个老板不是很满意你们的工作吗？一切都按照蓝图完成，把泥炭沼泽地切开剖开，把河岸也切开剖开，把

树林砍光烧光，把沼泽里的水引到大河里去，把大河岸上的树林也铲去，种柚木种圣当，十年八年，就发财啰！”（潘雨桐，2002：87）柚木可以作为木料亦可入药，故价钱相当昂贵。潘雨桐借梦伊丝的口，道出某个大财团视自己为自然的主宰者，不断地开发及破坏自然生态，只为了种植柚木以获取最大利益的贪婪心理。

又如透过〈旱魃〉篇娃希达和她男人之间的故事：

“……切口边缘都是一些杂木，大多是软质树种，而名贵的质材早在多年前都给人盗伐了。几棵伯公树高高地矗立在那里……”

“我不锯伯公树，这是规矩。”

“我就是规矩，加粮。”

“碍得了谁？”

“办公楼就从我脚下建上来，这一片山坡都要切割整齐。”（潘雨桐，2002：101）

“要砍伯公树就得加粮！”

“没有米了，拿钱来。”

“你只会要钱”

“我一个人吃了？我一份吞了？”

“一天到晚都是钱钱钱。”

“儿子是我一个人的吗？要吃要穿要上学，你没有份？”（潘雨桐，2002：102）

揭示人类盗伐了名贵木材的现象日益严重。接着管工为了建一座办公楼，无视山里的禁忌，雇佣男人锯掉仅剩几棵的伯公树。起初他不愿意接下这份工作，后来男人在管工的威逼利诱，和娃希达嫌弃他没本事养家的压力下，最后还是接受管工的雇佣。

以上三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人为了利益和生活而破坏自然生态。那些公司集团是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视自己为自然的主宰者，将自然生态视为赚取利益的资本，企图借此追求最多的利益，而员工则是因为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被迫选择从事破坏自然生态的工作。

潘雨桐除了向读者揭露人类对自然无情的行为，同时也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暗藏在故事情节里，并借助小说人物的口，谴责自私自利，无视自然生态以赚钱最大化利润的人类。类似这样的情节有很多，有时是一句对话，有时是一大段落，但都是较为零散的片段。若不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待潘雨桐的小说，则难以看出其暗藏的生态意识。

第三节 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

潘雨桐的《河岸传说》的结局均以非死即伤的悲剧作为收场，为的是从侧面反映出人类破坏自然，必遭恶报的因果关系。主角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助长了贪婪的本性。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是他们种下的“因”。生态文学作为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生态的发展，不可避免起冲突时，潘雨桐笔下的大自然发出愤怒的咆哮，死亡的结局便是他们破坏自然生态，所要承受的恶“果”。

自然生态无法口吐人言，潘雨桐便给予自然生态神奇的力量，让它们在忍无可忍时报复人类。其实自然生态在发动神秘力量之前，曾多次借着灵异现象、“**山里有山里的禁忌，河里有河里的传说**”（潘雨桐，2002：56），或原住民向人类发出预警，但人类却因贪婪的本性，妄想征服自然，而无视了自然生态发出的警告。

在〈河水鲨鱼〉篇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现象。李九认为他可以征服山鬼，于是向众人宣言“**一定会把山鬼用黄葛藤绑了回来**”（潘雨桐，2002：14），却被发现在旱溪躺了七天七夜，随后工友阿赖还在他躺过的地方跌断了腿。艾玛认为他触犯山里的禁忌连累了工友，并告诉李九这是山鬼给他的一个警告。

除了山鬼当地还流传着河水鲨鱼的传说，“**那些上游的河人说，那样的鱼是这条大河的河精，守护着这条大河。那些犯了罪的就给上天赶到大海里去，天天喝咸水，永远不得回来。**”（潘雨桐，2002：33）艾玛的男友杜维拉也曾听说过两个因捕捉鲨鱼而死亡的故事，一是他的父亲“**我阿爸和我说过，这条河有大鲨鱼.....我**

阿爸第二天就划了舢舨，带了大网等在河湾……我阿爸再也没有回来。”（潘雨桐，2002：21-22）一是河人老猴“老猴大概也抓了鲨鱼……老猴要不是抓过鲨鱼，怎么会死得那么惨？在河边来来去去的人，熟知河里的事，怎么会死在河里，泡得油桶那么粗那么大。”（潘雨桐，2002：33-34）这两人皆因试图捕捉代表自然意志的河水鲨鱼，而落得死亡的下场。无论是山鬼、河水鲨鱼、艾玛的迷信、和死亡的故事，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警告，只是人类被利益蒙蔽了视线，而忽略了自然生态神秘的力量。

杜维拉和李九不相信这些禁忌传说，还为了河水鲨鱼奇特的药效，相约到河湾捕捉鲨鱼。当他们走到旱溪时，“山雨来得十分剧烈，顺着风势，横扫过陡峭的石壁，一下子便卷了过来。山精李九和杜维拉抵挡不住，背转身子想回头走，洪水却从石湾处一拐而出，犹如万马奔腾，掩过奔逃的两个身影，淹过推土机，一泻而下。”（潘雨桐，2002：42）捕捉鲨鱼是他们种下的“因”，所以当它们刚好路过常年无水的旱溪时，才会被涌入的洪水冲走。这是自然回报他们的“果”，其下场正印证了河岸传说“那些犯了罪的就给上天赶到大海里去，天天喝咸水，永远不得回来”（潘雨桐，2002：33）的结局。

在〈旱魃〉篇娃希达有一位名叫阿露的朋友在环境部打工。她经常向娃希达灌输环保思想，可娃希达的男人并不相信这些，还说“你最好不要和她在一起。那个女人，老是说些颠三倒四的话，山鬼天蒙蒙就到河边喝水，走的时候还会留下一朵血红色的花。她以为她是谁？还帮着研究站的人说话，不可以砍树，不可以杀人猿，不可以捕大头鸟，不可以捉河里的鲨鱼——最好河里的鲨鱼吃了她，癫人！”（潘雨桐，2002：105）阿露的环保思想并非以科学的角度来诠释，而是结合了旱魃的禁忌

传说来告诫人们不要砍伐树木，否则旱魃会将河水喝干。后来男人接受管工的雇佣砍掉具有历史性的伯公树，其结果是“一边的枝桠凌空坠落。男人扑倒在地上，手提电锯死在一边。新锯的板根柔白的层面泛着雪光，在亮白的阳光下结成一朵血红的山花。”（潘雨桐，2002：106）在男人接受雇佣时已种下了“因”，而被倒下的树干压死是他所承受的“果”，而那朵血红色的花便是他遭到旱魃或山鬼报复最好的证明。

小说人物的名字如水鬼、山精、山鬼等和山里有山里的禁忌，河里有河里的传说，无不暗示自然拥有神奇的复仇力量。其实这股力量，并非是潘雨桐虚构的事实，只是它不像小说里那样针对贪婪的人类进行报复。当它一旦在现实中展示力量，其带来的影响会是全球性的，如〈沼泽地带〉篇出现的拉尼娜现象，和厄尼诺现象。潘雨桐深知这点，于是重新赋予自然神秘力量，让自然生态针对贪婪的人类进行报复，为的是让人深刻地了解破坏自然的因果定律，即破坏自然，必付出生命的代价，企图让人们为自己无视自然的行为进行反思。

第四章 《河岸传说》所运用的艺术手法

第一节 意象特征

意象是指作者“对于过往形象记忆的一种重现和描绘”（王耀辉，2000：23），故笔者将在此节分析潘雨桐如何借着对“象”的描绘，把他主观印象的“意”即生态意识传达给读者。《河岸传说》中的意象类型相当丰富，笔者将其分为自然、动物、和抽菸意象。

自然意象方面有太阳、云、风和雨。在〈河水鲨鱼〉篇：

“火烧云在变幻，刚刚还巧热血红，现在却底层转暗，渐渐的变成浅紫深紫，灰褐赭褐，渴望与焚烧过的大地连成一片。”（潘雨桐，2002：9）

“火烧云沉寂了下来，喧哗的变化快到尽头，只在云边镶嵌一圈微薄的金边，而相接的山陵和雨林，已变成幽暗的灰蓝。”（潘雨桐，2002：13）

潘雨桐将太阳形容成火烧云，借着它的变化来推移时间，同时向读者呈现出大地在雨林被焚烧后破败的景象。在〈沼泽地带〉篇则以风和雨的意象为主：

“强风挟这暴雨都快下了一个钟头了，全没有停止的迹象，隔着模糊的玻璃窗望出去，那一排工人宿舍在风雨里倒像一艘破船，忽而静止忽而飘摇。”（潘雨桐，2002：167）

这场暴风雨是贯穿全文的主要线索，开头潘雨桐便透过这场风雨让我们知道人类正肆意地开发沼泽地，所以才出现工人宿舍林立的场景，这同时也是暴风雨形成的原因。

《河岸传说》每一个篇章的动物不完全一样，其中包括有鲨鱼、山鹿、猿猴、大象、鳄鱼和犀鸟等。在〈山鬼〉篇出现的动物最多：

“山里猿猴的啼声偶尔一声两声地传了过来，越传越近，越传越近，忽而终止在水湖边。传言有人在那里盗伐林木……而保护林带沉默寡言，除了猿猴啼叫，偶尔给盗伐林木倾倒的声响惊吓而四处奔逃，恐怕就又有野鹿越过溪谷踩在石板上的拓拓蹄声了。”（潘雨桐，2002：118）

“受了伤的野象群从垦殖区被驱赶了出来，夜里疯狂地踩过他的木寮，野牛从山崖弯处的沼泽突然和他相遇对着他顿脚，他除了躲避，可从来没有通报过猎人。那几个荷枪的猎人不是当风就可以嗅到野兽的骚味吗？而最常见的杀戮场，是在大河沿岸的平坦地带，循着泥沼上印下的一个个的爪印蹄印，可以想象月光下走过或是到大河喝水的群兽是惊慌还是悠然自得。最忌的是那些独来独往的足迹，要是遇上了，猎人可能易位成猎物。”（潘雨桐，2002：129）

动物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然而在文中这些动物不是被逼得四处逃亡，就是被猎人追捕成为经济或食物来源。潘雨桐描写人类对待鲨鱼、山鹿、猿猴、大象等动物的态度，使笔者联想到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文中的他是阿巴厉斯，是个尊重山林禁忌的电锯工，所以平时尽可能不去伤害山林里的动物。阿巴厉斯尊重山林禁忌等同于尊重自然，从某程度上象征着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而那些肆意猎杀动物的猎人，则象征着将自然生态等同于利益价值的人类。若再不恢复共生关系，人类主宰自然的现象将会“易位”。

虽然抽菸不是最主要的意象，但潘雨桐笔下的大部分人物都有抽菸的爱好，且是以穿插的方式呈现出来，故笔者认为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尝试分析潘雨桐所要表达的意象。在〈河水鲨鱼〉篇：

“……才把香菸狠狠地往地上一甩。”（潘雨桐，2002：18）

“山精李久把菸蒂往河里一丢。”（潘雨桐，2002：23）

在〈旱魃〉篇：

“他这个人一早起来就要抽菸，还把菸蒂随手乱丢，上个月贮油库失火，在昏黄的天色里烧得半天通红，说不定还真是他的粗心大意惹的祸。”（潘雨桐，2002：97）

“随手往外一扔的香菸盒就在脚边”（潘雨桐，2002：102）

在〈河口〉篇：

“……嘴里的菸却抽得叭叭响，摘下来一看，潮了，顺手一丢，落在水鬼脚边。”

“他一急，摘下嘴里叼着香菸连同散开了的火柴，就往河里甩了去。”（潘雨桐，2002：203）

潘雨桐主观印象中，抽菸的人都有随手扔菸蒂的习惯。笔者认为他将这个现象写入文中，是因为人类爱护环境的意识并不高，就连在〈河口〉篇象征着共生关系的林芋头亦不例外。抽菸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同时乱丢菸蒂也会提升森林火灾的发生。于是笔者认为潘雨桐借着描写贮油库失火的事件，让人明白保持良好的习惯，做好身边的小事情，也是一种保护自然生态的行为。

第二节 魔幻叙事手法

潘雨桐是以魔幻书写的方式，带出其作品的中心思想，即把“把神奇魔幻的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描写结成一体.....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融入神奇怪诞的人物、故事、情节和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读来似真似幻。”（许文荣、孙彦庄主编，2012：425）。潘雨桐在东马热带雨林工作期间，除了见识了大自然外，也认识了不少当地的少数民族，听闻了各种各样的迷信禁忌。于是潘雨桐的魔幻手法结合了乡土写实的笔调，即把当地的迷信禁忌，加以魔幻成超现实的意象，再把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大肆开发森林，所造成的后遗症结合在一起，从侧面反映出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必遭报应的因果关系。

笔者从潘雨桐〈河岸传说〉和〈山鬼〉篇里，清晰地看到这种魔幻叙事手法。〈河岸传说〉篇里的主角阿楚和原住民萝伊丝是男女朋友关系。阿楚的公司要开发泥炭沼泽，而他的工作便是在雨季来临前，开沟挖泥，把沼泽里的积水排放到京那巴登岸河。阿楚破坏沼泽的行为触犯了“山里有山里的禁忌，河里有河里的传说。”（潘雨桐，2002：56）于是在这篇小说里，萝伊丝成为超现实的意象的代表：

“路旁那棵大树上张着火扇，飞快的转成火球”

“火球滚到他身边马上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

“老太婆把脸皮拔了下来，眼睛鼻子嘴巴，慢慢的变慢慢的长，变成一个漂亮的少女。少女盈盈的笑着，手一牵扯下灌木上的一根刺，往阿楚的手心一划，而后往唇边一点——一颗圆溜溜的美人痣就鲜活在那里。”（潘雨桐，2002：53-54）

“萝伊丝在大树下站了一会，而后慢慢的往树林里走……她轻轻的咳了一下，伸手往脸上轻轻的拨着。长发忽然变得枯焦，花白，光滑的脸庞慢慢的皱缩成许许多多的皱纹、脉络。而那唇上的美人痣也忽然掉了下来，在一片苍绿的草叶上沾个血点。”（潘雨桐，2002：97）

潘雨桐将萝伊丝魔幻成山魅水妖。当她看到由山鹿不甘死亡的铜铃大眼，变化成的“火球”时会念咒语，并表示看见火球的人，再吃了山鹿的肉后一定会有灾难。此外，她还常以水妖的鬼神之说，来诠释自然界变化莫测的现象，其诡异的变身过程和怪异的行为举止，不禁让人不寒而栗。至此可以确定，萝伊丝是山魅水妖的化身，她来到阿楚的身边，是为了代替大自然进行报复。潘雨桐以这种诡异离奇的方式，来警示人类早晚会为自己破坏大自然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在出事前，自然也曾以超现实的灵异现象对阿楚发出警告：

“有什么不对吗？青青绿绿一片，也没像你昨天说的横沟那样，刚挖好，一转眼又填满了泥土。”

“你的挖沟机不是好好的停在这里吗？”

“你不觉得奇怪吗？那片泥炭沼泽地，为什么没有挖沟机履带压过去的痕迹呢？”

（潘雨桐，2002：55-56）

“怎么搞的？还没开工就卡在这里。……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驾驶座爬了下来，红色的外衣蓬蓬的，在河岸边慢慢的移动。”（潘雨桐，2002：60）

然而阿楚并没有停止挖沟的行为。若他没有开沟挖泥，导致土地松软，当河水倒灌时他还有一线生机。可惜最后还是在萝伊丝的目光下，因脚下的土地松软，而被倒灌的河水冲走。阿楚的下场和《河水鲨鱼》里的李九和杜维拉极其相似，只是前者触犯的是山鬼和河精，后者触犯了水妖和山魅的禁忌。

若说潘雨桐在〈河岸传说〉魔幻了人物的形象，那〈山鬼〉则主要是魔幻了故事情节。此篇是以开山伐林以发展油棕业为背景，铁头有着二十年的驾驶推土机的经验，有几次在山林中大难不死的经历，但最惊险的莫过于在山林目睹了的诡异的幻像后，在平道上翻车，“…卡车上的人欢呼着，他的背脊更冷，渐行渐近，卡车已不是卡车，而是一颗千年大树，枝枝干干上，挂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兽肢体，血水淌流在山道上成了一道浮动的缎带。他的推土机开在缎带上，不住的上下飘动，左右摇摆——遽尔翻覆。”（潘雨桐，2002：161）更诡异的是他的工友，摸不到他的被推土机压着的下半身，就好像有东西抓着铁头不放。另外一个工友阿巴历斯，同样是个有着二十年经验的电锯工。他因遵守雨林的禁忌传说，平时尽可能不去伤害动物，所以他没发生过大灾大难。

忽然有一天，阿巴历斯满身是血地被几个人抬了回来，即使修养了一个多月也不见起色，身上的肉就像给电锯削了去似的。后来才得知他砍了千年大树，触犯了山鬼的禁忌，潘雨桐是以魔幻叙事的手法描绘出整个过程。“……忽而从大树的顶端真的撒下沙子来。他惶恐的仰头来，飘雪似的，大树梢已是一片朦朦的白，纷飞而下的已不是沙子，而是锯屑，漫天的锯屑，那是他十多二十年来锯树累积的锯屑，全都汇集到这棵大树顶端向他撒洒下来。他的脚下也一片白。他想挪动身子，但已来不及，锯屑封住了他的双腿，及而堆上腰间，到了肩膀，整个人便埋了进去。的手提电锯飞离了身边，整棵大树也拔地而起——倒了下去。”（潘雨桐，2002：133）虽然这两人都从事破坏自然的事业，但在心里还是敬畏着自然生态神秘的力量，所以其结局是阿巴历斯重伤在卧，而铁头则躺在医院生死不明。他们不像其他人物以死亡的结局作为收场，但也仅是稍微好一点罢了。

在《河岸传说》中，潘雨桐巧妙地将河精、水妖、旱魃、山鬼等超现实的意象，融入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来作为大自然反击人类的力量，给予肆意破坏环境的人类，不可挽回的惩罚。潘雨桐最后再以死亡的悲剧，作为他们的宿命，借此起到警戒和压抑人性贪婪的作用，毕竟最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莫过于死亡。

第五章 结语

潘雨桐在外留学的阅历，和扎实的写作技巧，促使他写下许多优秀的作品，并受到了白先勇、王德威、高阳、蔡源煌等著名作家高度的肯定。返回马来西亚后，他在热带雨林工作的经验和阅历，则促使他写下《河岸传说》。这不仅是部描写热带雨林为主题的小说，同时读者也可从少数民族、魔幻现实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多重视角，来分析潘雨桐的《河岸传说》，而笔者则选择以生态文学的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经过笔者的分析后，笔者认为其所蕴含的生态意识有三。其一，是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其二，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其三，是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

潘雨桐的生态意识是在热带雨林工作后开始觉醒。雨林中的所见所闻，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让他将心中的领悟、反思和感受化为文字，于是有了《河岸传说》这部作品。在小说中，潘雨桐透过原住民的回忆，人和自然其乐融融的情景，说明两者是处于共生关系。接着在将原住民对禁忌传说的敬畏，和人类无视禁忌传说的态度进行对比，从而揭发了两者之间关系失衡的事实和原因。笔者从文中分析出的原因是，人类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的发展，加剧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而开始无视自然的意志。最后潘雨桐再透过意象和魔幻叙事手法的运用，魔幻了人物和禁忌传说，来对人类进行报复，试图以悲剧的命运，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从而使两者之间恢复平衡的状态，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

有论者认为潘雨桐一方面创作生态文学的作品，一方面却从事园丘经理的工作，似乎非常矛盾。然而笔者在分析他的《河岸传说》后发现，工业化的兴起不是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而是由人类对物质的追求，膨胀的欲望所引起。人类的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不可能倒退回到从前，即使潘雨桐没有从事这份行业，总会有类似杜维拉的人，为了生活和利益，而从事这份行业。

既然如此，身为马华作家的潘雨桐，不可能对此漠不关心，于是他致力于生态文学的创作。在小说中，他大力谴责的对象，皆是因贪婪而过度破坏自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人类，并让人明白回到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共存关系，才是避免生态危机发生的最好方法。因此在明白这点后，笔者认为只要潘雨桐是以珍爱热带雨林的心态，他创作生态文学作品，和他所从事的行业并没有太大的冲突。

参考书目

（一）参考书目

1. 陈思和、许文荣主编（2014），《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雪兰莪：马来亚大学中文。
2. 戴小华、叶啸编（2006），《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3. 傅承得主编（2013），《催绿禾苗的春雨：何乃健作品评析》，雪兰莪：大将出版社。
4. 金进（2013），《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5. 鲁枢元（2001），《猗猗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潘雨桐（2002），《河岸传说》，台北：麦田出版社。
7. 田思（2006），《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雪兰莪：大将出版社。
8. 田思、何乃健（1999），《含泪为大地抚伤》，吉隆坡：千秋事业社。
9.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2012），《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下册）》，霹雳：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
10. 王诺（2003），《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1. 王耀辉（2000），《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期刊论文

1. 陈大为（2002），〈寂静的浮雕——论潘雨桐的自然写作〉，《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页73-77。
2. 方军、陈昕（2003），〈论生态文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页141-144。
3. 许文荣、李树枝（2011），〈论马华后现代文学的文体转向〉，《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页74-84。
4. 游杰华（2016），〈论潘雨桐的婆罗洲雨林自然写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2月，页19-25。
5. 朱崇科（2014），〈后殖民时代的身份焦虑与本土形构——台湾经验与潘雨桐的南洋叙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页39-49。

（三）学位论文

1. 陈韦贻（2010）。《书写雨林——潘雨桐的小说中的南洋图象》，博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
2. 刘秀丽（2015）。《潘雨桐生态文学研究》，硕士论文，南京大学，南京。
3. 骆世俊（2012）。《传承、扎根与开拓——论商晚筠、潘雨桐和黄锦树小说的中心意象》，硕士论文，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金宝。
4. 祁松林（2016）。《“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新疆大学，新疆。
5. 王顺玲（2013）。《生态伦理及朱生态伦理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6. 张晓琴（2006）。《论生态文学的环保思想与现实价值》，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南京林业大学，南京。
7. 张莹（2013）。《福斯特的生态危机理论研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8. 庄慧洁（2011）。《论马华文学的少数民族书写》，硕士论文，拉曼大学中文系，金宝。